

20世纪
欧美文论
丛书

方法、批评 及文学史

〔美〕昂利·拜尔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十世紀歐美文論叢書

方法、批評及文學史
——朗松文論選

中國社會科學院 外國文學研究所
二十世紀歐美文論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美〕昂利·拜爾編

徐繼曾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白 烨

责任校对：易小放

封面设计：宁成春

版式设计：王丹丹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

方法、批评及文学史

——朗松文论选

〔美〕昂利·拜尔 编 徐继曾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经 销

北 京 新 魏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625印张 2插页 446千字

1992年 2 月第1版 1992年 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500 册

ISBN 7-5004-1056-5/I·108 定价：10.60 元

内 容 提 要

法国著名文论家朗松因在文学研究中恪守求实精神，被人们誉为实证主义批评的代表。本书选收了朗松论述文学史方法、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史学，以及用其理论和方法具体评析蒙田、莫里哀、高乃依、伏尔泰等人的重要论文27篇，从理论宣言和评论实践两个方面展示了“朗松主义”的独特风采，为人们了解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所必读。

编者导言

文学批评家在身后五十年或一百年，仍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对其作品一再进行研读和利用的非常少见。文学史家的著述在半个世纪以后，能不被人们看成是陈旧得可笑、散发着时代偏见和派系成见的臭味、论证依据很不充分的，就更加少见。《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史》^①今日依然值得赞赏，特别是其中与让森派人士有关的那些部分。圣伯夫这部巨著虽然不乏糟粕，但还是很容易从中选出对今天仍然有益的两三卷（主要是关于过去几个世纪中的二流作家的，另外关于拉马丁、缪塞、福楼拜、泰纳和勒南的也还可以算进去）。而尼萨尔、维尔曼、谢雷、J.-J. 韦斯、萨尔塞、勒梅特尔、布吕纳介^②，则差不多只对某些以鉴赏趣味和

① 《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史》(Port-Royal)——出自圣伯夫之手，出版于1840至1859年间。波尔-罗雅尔修道院，13世纪初建于巴黎乡间，16世纪末由阿尔诺(Arnauld)家族重建，至17世纪初成为让森派(天主教内部接近加尔文教义的派别)活动中心，在法国思想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帕斯卡尔的《给一个外省人的信》、阿尔诺及朗斯洛(Lancelot)的《普通理性语法》，阿尔诺及尼哥尔(Nicole)的《波尔-罗雅尔逻辑学》等均出自该修道院。

② 尼萨尔(Nisard, 1806—1866)，法国文学批评家，著有《法国文学史》(1844—1861)。维尔曼(Villemain, 1790—1870)，巴黎大学法国文学教授，著有《法国文学教程》(1828—1829)。谢雷(Schérer, 1815—1889)，法国文学批评家，著有《当代文学研究》(1865—1895)。J.-J. 韦斯(J.-J. Weiss)，与泰纳同时的新闻记者、文学批评家。萨尔塞(Sarcey, 1827—1899)，法国戏剧评论家，留有文集《戏剧四十年》(1900—1902)。勒梅特尔(Lemaitre, 1853—1914)，法国作家、戏剧评论家，留有《戏剧印象》(1888—1920)。布吕纳介(Brunetière, 1849—1900)，法国文学评论家，是继泰纳之后法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重要代表。

思想对文学的影响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才有吸引力了。波德莱尔无疑跟泰纳一样，是上世纪中叶最有见地的批评家，但他在文学方面的涉足仅限于泛泛谈论戈蒂耶、雨果、福楼拜，对巴尔扎克更只是附带地捎上一笔。古尔蒙虽然也跟日后的蒂博代一样，以轻松的笔调从事陶冶思想的工作，但他给今日想更多地理解洛特雷亚蒙^①或兰波、波德莱尔或象征主义的人们留下的有益的篇章并不多。法盖^②虽然善于信口开河，对十七世纪古典作品、对伏尔泰或卢梭也没有发表过多少真知灼见，但他至少在三卷《政治家和道德家》中描绘了十来个十九世纪思想家的肖像。这是值得一再重印、反复阅读的极少数好书之一。至于完整的法国文学史，自从这种类型的著作出现以来，在已经出版的著述中，无论是一人撰写或是多人合编，也无论是用法语或用其他语言所写，还没有哪一部能与居斯塔夫·朗松的著作相匹敌。当我们想到，这部《法国文学史》的作者在写完此书时尚不满三十七岁，而他就这一专题已经在外省中学讲了六年课，在巴黎各中学连续讲了七年课时，我们怎能不感到惊讶。当时各学院对年轻人根本没有什么资助，既没有什么全国科学研究中心支付的研究年假，也没有前往国外图书馆收集资料的旅费补助。一直到了一九〇〇年，在高等师范学校已经当了几年代课教员之后，朗松才在四十三岁上踏进巴黎大学，当上了副教授。

一部取得如此成功，迄今也难被替代的著作，当然不会不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妒忌和愤怒。有人也不无道理地指出书中关于

① 古尔蒙(Gourmont, 1858—1915)，法国作家，象征派权威批评家之一。蒂博代(Thibaudet, 1874—1936)，法国文学评论家。洛特雷亚蒙(Lautréamont, 1846—1870)，法国诗人，于24岁时早逝，在世时毫不知名，20世纪初超现实主义兴起时，将其《玛尔伦梦之歌》(Chant de maldoror)奉为圣经。

② 法盖(Faguet, 1847—1916)，法国学院派文学评论家。

中世纪各章的不足,的确,自一九〇〇年以来,加斯东·巴里斯和贝迪埃^①以及后来的许多人,在法国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都更新了我们中世纪的认识。有人讥笑朗松的某些分类过于简便,例如被他称之为“落后于时代与迷途的”诗人中,包括我们今天认为应该是巴洛克或“先古典主义的”诗人(两者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朗松在他的文学研究初期受布吕纳尔的威望和雄辩的影响,显然对布瓦洛、对博叙埃给予的篇幅过多,而对非正统作家,对不信教的作家注意不够。这种现象,不久后他就在一系列关于哲学思想起源的卓越的讲座中作了补正。这些讲座更新了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时代的看法,这在巴黎大学教学中还是前所未见的。然而就在这部教科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关于笛卡儿、帕斯卡尔的透彻精辟、内容丰富的篇章,可以读到关于“拉辛的诗歌境界”的耳目一新的论述,而特别是第十一版(该版添有极其感人的注记,道出作者对旧说的修正)关于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的章节,其见地之深刻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自十九世纪起,我们对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奈瓦尔的看法跟朗松完全不一样了。象费尔南·房代朗(Fernand Vandermere)这样有时颇显才华的专栏作家们,自不难就朗松对波德莱尔或兰波所作的评论进行恶意中伤,对朗松给予小仲马、苏利-普吕多姆和埃雷迪亚^②过多的篇幅提出异议。可又有谁知道有朝一日不会有人来给这些作家恢复名誉?文学史也许照例只应写到作者写作时的五十年前就打住。蒂博代、莫尔耐,甚至是拉鲁^③(他

① 加斯东·巴里斯(Gaston Paris, 1839—1903),法兰西大学堂(Collège de France)教授,中世纪文学专家。约瑟夫·贝迪埃(Joseph Bédier, 1864—1938)是加斯东·巴里斯的学生。

② 苏利-普吕多姆(Sully-Prudhomme, 1839—1907)、埃雷迪亚(Heredia, 1842—1905)都是法国诗人,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帕尔纳斯派。

③ 莫尔耐(Daniel Mornet)法国大学派文学批评家。拉鲁(Lalou),法国文学评论家,写有论文《论批评》(Sur la critique, 1937)。

可早在一九二二年就依稀感到普鲁斯特、纪德、克洛代尔和瓦莱里将占优势，至少为他的后继者提供了这个看法)和克莱贝尔·哈登斯^①，在为跟他们同龄或者年纪更轻的作家作出评价时，运气并不比朗松好到哪里去。朗松至少有甘冒风险的勇气，他于1893年在《晨报》，甚至在《人道报》(在法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编辑的文学专栏上就谈到马拉梅，当时在大学内外是极少有评论家把这位为“有翅难展的土地的可憎”而愤愤不平的普普通通的英文教员认真看待的；他还早在一九一六年以前就从事戏剧评论，并堪与莱翁·勃鲁姆^②的评论相媲美，也与通俗化了的大学派评论家福蒂纳·斯特劳斯基(Fortunat Strowski)和比埃尔·奥迪阿(Pierre Audiat)以及令人眼光缭乱的罗贝尔·康普(Robert Kemp)的戏剧评论(他们后来都是只要有彩排就必到的)不相上下。

十分伟大的评论家从来也没有过，也许将来也永远不会产生。他们当中最博学的也永远抵不上一个真正的诗人或者真正的小说家；最优秀的绘画评论家或者音乐评论家都早在那些画家和音乐家被人遗忘以前就被人忘掉了。哲学体系的创始人与哲学史家之间总有一条鸿沟隔开。正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③中那句无情的名言所说的那样，那些围着艺术作品嗡嗡乱叫的评论家、阐释家、夸夸其谈的演说家、词藻华丽的文字匠，可能就意味着艺术创作激情的衰退，把艺术享受本身置于险境。亚历山大文化并不仅仅或者并不特别存在于被我们称之为古老的国家之中，就在我们中间也有。越来越多的教员都自然而然地认为，但丁、塞万

① 克莱贝尔·哈登斯(Kléber Haedens, 1913—1976)，新闻记者，文学评论家，著有《法国文学史》(1943)，一反传统文学批评与体系精神。

② 莱翁·勃鲁姆(Léon Blum, 1872—1952)，法国作家、政治家，早年即以戏剧评论见著。

③ 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1776—1788)在近代罗马史学中颇有地位。

提斯、莎士比亚、波德莱尔和叶芝之所以写作，就是为了在中学里的那些批评家，就是为了他们那些驯服的学生，他们接受一种狭窄而专门的评论的训练，而这种评论，他们十个当中倒有九个是一辈子也不会从事的。

应该重复一句，对于那种在与作品接触时不受感动，却把作品拿来当作建立既精巧又沉重的理论骨架的文学批评进行批判，朗松从来也没有鼓励过。他在他的文学史的序言中强烈反对“要把自然科学的形式强加给文学”，只考虑实证知识的“那种可悲的迷信”。在这篇序言里，这位年轻的中学教员反对勒南^①在年轻时分过分热衷于野心勃勃的语文学的时候，没有多加考虑就仓促说出的那句倒霉话，说什么文学史的学习“旨在代替大部分直接阅读人类思想产物的工作”。朗松首先关注的是把读者引向作品本身，使得他们在具备更多的知识时，从作品中获得更多的乐趣。在把作品的讲解这种实践在法文教学中的地位确立起来这一点上，朗松的贡献比谁都大。但跟任何一种方法一样，这种做法实施久了也就陈旧了。它被归纳为几张只消机械地予以应用的处方。而在比法国更向风格学的研究开放、对语言结构和结构主义更加热衷的国家，这种方法变得更加完善；但人们过分追求精巧，反而把这个方法败坏了。而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中，这种方法使文学教学取得的进步，对人的思想和趣味的培养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在为他赢得声誉的这部《法国文学史》的前言中，朗松一再强调：“文学是用来为我们提供乐趣的……我不能理解人们学习文学除了培养自己的才智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目的，除了从中取得乐趣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理由。”

* • •

① 勒南(Renan, 1823—1892)，法国史学家、作家。

人们时常或者高傲地或者酸溜溜地称之为“朗松主义”的这个东西，在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三年间可遭到了误解、妒忌和敌意。一大批年轻人，自称是代表全体法国青年，乐于把文学和政治搅和在一起——在法国这是常事。他们办报办刊，鼓吹极端民族主义，要国家倒退到过去，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教古代和现代文学的教授们以及语文学家们引进法国的所谓科学的和德国的方法表示怀疑。他们担心优美的文体行将消灭，轻盈的风韵、善辩的头脑、对艺术的爱好行将削弱——而正是在这些地方，人们可以看到足以抵挡德国风的法兰西传统禀赋。出之于对前途的恐惧与深刻的不安全感，这部分学校青年对科学、方法、对根源的探索、文本的确定以及书目文献展开猛烈的攻击，希望法国文化反求诸己，一心只看她自己光荣的历史。昂利·马西斯^①以“阿加东”为笔名写了一系列关于《新索尔邦的精神》的文章，一九一一年由《法兰西信使》发行单行本，痛斥那些把“我族固有本性……，由秩序、清晰与高尚趣味构成的法兰西民族精髓”置诸脑后的大师们进行的教育。两年以后，还是用从柏拉图《飧宴篇》中借来的这个笔名，昂利·马西斯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Alfred de Tarde）在他们的《今日的青年》（普隆出版社，1913）中声称要抛弃对艺术的爱好和理性主义，鼓吹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理想，摆脱热爱客观主义的大师们要教给他们那些细致的研究方法。比埃尔·拉塞尔（Pierre Lasserre）也脑袋发热，在一九一三年还对《巴黎大学的官方学说》进行了大肆攻击。

很遗憾，朗松的这些对手当中最恶毒的竟是夏尔·贝玑^②。

① 昂利·马西斯（Henri Massis，1886—1970），法国作家，为民族主义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的积极分子。

② 夏尔·贝玑（Charles Peguy，1873—1914），法国作家、诗人，狂热的天主教徒，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感情。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于马恩河战役中阵亡。

他指责朗松的学生们，尤其是居斯塔夫·吕德莱（Gustave Rudler），说他们胆敢把他们的老师比之为新世界的发现者。事实上，朗松的门徒们有时却讽刺朗松的方法，而对他为印象派批评保留权利的那些委婉谨慎的言词避而不谈，他们也愚蠢地把他的告诫编成法典式的东西。吕德莱，也许还可以加上达尼埃尔·莫尔耐，他们在研究工作中的特点是学术上的诚实、不偏不倚、稳重谨慎，但他们全都没有继承朗松对文学的真正的热爱，也没有继承他的哲学力量。朗松在索尔邦主持的法国雄辩讲座接的是居斯塔夫·拉鲁梅（Gustave Larroumet）的班，他自己的后任则是居斯塔夫·米肖（Gustave Michaut）——索尔邦讲座的主持人仿佛注定要由名字叫居斯塔夫的人担任似的。居斯塔夫·米肖在分析的精辟方面也难以与他的前任相匹敌。在朗松那些忘恩负义的学生眼里，朗松也许不算什么，而这些学生却正是朗松所有学生当中最优秀的那几个人，也是勒南晚年希望他们能学习他们老师的独立精神起来造他们老师的反的那几个人。贝玑寿命苦短，未能看到在法国的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文学教学、在英国的法语教学（部分地得力于吕德莱）以及在美国的法语教学（主要得力于莫理士，他是朗松观点的优秀的发扬者），五十年来应该归功于朗松之处是何等之多。贝玑在《克利俄》，特别是《金钱续编》（1913）^①中喋喋不休地指桑骂槐，愚蠢地攻击朗松那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朗松写下了他在美国担任三个月的教学所得的印象，而这三个月却有助于使一批很有前途的美国研究人员，转向法国的方法与精神，有助于使一些美国大学把视线转向巴黎。他指责朗松以四十之年顿生野心，摆脱中等教育（高等师范学校出身的贝

① 《克利俄》（Clio）是一部关于历史问题的对话集，作于1909—1914年之间，于贝玑身后发表。《金钱续编》（L'Argent suite）与《金钱》（L'Argent）都是论战文。

玠还从未能当上中学教员)，登上高等学校讲座，从而表明他并不爱他的学生。他还怪怨他“卑劣地、丑恶地”抛弃布吕纳介。在朗松《博叙埃》(1891)一文中，显然可以看出他深受布吕纳介这位雄辩的演说家的影响，而他后来也象许多正直的人一样，在旷日持久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擦亮了眼睛。当布吕纳介以一个道德家的热忱攀登“信仰之路”时，朗松则认识到对作品的批判性阅读对真理的发现与错案的纠正所能起的作用。他为支援世俗教育，为自由主义，为探求积极的道德而努力工作。但他决不是他那位年轻的同乡(贝玠和他都是奥尔良人)所痛斥的在德雷福斯事件胜利结束后，把神秘主义转化为政治权术的那种人。这位伟大的大学教授从来不热衷于荣誉，他跟拉维斯、保尔·阿扎尔^①或约瑟夫·贝迪埃不一样，从来不受法兰西学院的诱惑。

无论是在文学方面还是社会科学方面，甚至是在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任何革新家都会遭到这样的误解，遭到这样的歪曲。朗松原本可以是一位令人生畏的论战家的，可是他不愿为驳斥他的敌人而浪费时间，只在少数场合是例外，例如对一位叫夏尔·萨洛蒙的中学教师的不公道的歪曲，他认为有必要予以纠正，因而在1911年四月十日的《每月评论》(Revue du Mois)上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朗松克制而冷静，他不善词令，不善装腔作势。他说话时嗓音低沉而温和。贝玠将他恶毒的判决凝为一个句子，在《金钱续编》中写道：“谁要是没有见识过朗松先生的温和就不知加糖香醋、胆汁蜜饯为何物。”

更叫人伤心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左右两派的法国人一时和解，民族主义的青年对新索尔邦的大师们的攻击不再围绕

① 拉维斯(Ernest Lavisse, 1842—1922)，法国历史学家，1892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保尔·阿扎尔(Paul Hazard, 1878—1944)，法国文学史家，思想史家，194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爱国主义这个问题了(杜尔克姆^①和朗松是遭到攻击最多的两位教授,他们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独生子;他们以笔为法国服务,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但另有一些论战家把矛头指向枯燥的博学,指责朗松鼓励了这种东西。人们对几部文学史教科书中的不足之处吹毛求疵,其中就有朗松的那部,说是反映了过时的观点。费尔南·房代朗的多卷本《文学的镜子》,今天看来浅薄得可怜,他当时却在《法兰西评论》发动了教科书之争。瓦勒里·拉尔博^②这位使法国人发现几位外国作家的自由思想家,在他那卷《技巧》(1932)中提出要把所有博士论文和所有教科书都改成大事记。历史学家无需是政治家,他只消把卡片整理好交给评论家先生们过目就行了。这些人都忘了,从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三〇年的文学批评家(雅克·里维埃、夏尔·迪博斯^③很少过问这些批评家),没有哪一个能跟朗松相提并论。

离我们更近的一些批评家不无自负地宣称在这个领域里,没有谁比他们的朋友们和他们自己更有才气,他们其实从不曾劳神去读一读朗松的著作,就指责他是实证方法的代言人(实证方法这个词莫非是个骂人用语?)。他们大量引用索绪尔,引用莱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引用巴什拉尔或乔治·布莱^④的繁琐而极其

① 杜尔克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

② 瓦勒里·拉尔博(Valéry Larbaud, 1881—1957),法国作家,曾将惠特曼、巴特勒、乔伊斯介绍到法国。

③ 雅克·里维埃(Jacques Rivière, 1886—1925),法国作家,《新法兰西评论》创始人之一;夏尔·迪博斯(Charles du Bos, 1882—1939),法国文学批评家;两人都写有许多评论当代作家的论文。

④ 索绪尔(Saussure, 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莱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结构人类学的创建者。巴什拉尔(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法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他的认识论更多地是属于科学与认识的认识论,和柏格森一样既信任理性,又信任想象。他是法国新批评先驱者之一。乔治·布莱(Georges Poullet)的理论也深受巴什拉尔影响。

刻板的理论，通过这种引用，用他们所谓的阐释批评与朗松的实证主义相抗衡。为了把他们认为已经死了的学院式文学批评深深埋葬，他们为这种批评描绘了一个纯系歪曲的形象。他们硬说这种倒霉的批评未曾得到机会来认识现象学为何物，一心只“把作品跟作品以外的东西，也就是跟文学以外的东西拉上关系。”（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两种批评”，《现代语言札记》，第78卷，第5期，1963年，第447—452页）。仿佛朗松在他那部杰作《法国悲剧史提纲》（1920）或另一部著作《伏尔泰》当中，撇开了作品只谈来源、参考书目或社会学似的。

对漫画化了的朗松主义，最令人遗憾而且既不公平又太轻率的斥责，来自一位英国教授。他退休在家时，忽然心血来潮，要把他在威尔士和英格兰听众面前发表的演讲结集出版。这位珀西·曼塞尔·琼斯(Percy Mansell Jones)教授巧于词令，虽然有些外行，有时倒也逗乐，他的气质可使他跟朗松严格而富有哲理的思想既相去甚远，又跟已在牛津当上教授的吕德莱在把他的老师说成是不近人情的那种强横更相径庭。文学史这座宿舍或者这个实验馆，本来就不止一个房间，而英国人的派头既彬彬有礼，又有幽默色彩，古朴之风实在令人可喜。

然而，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对法国文学的攻击及其他》的集子中的文章颇为单薄，篇与篇之间也缺乏连贯性，这本书无论如何是个不祥之兆。集子里的文章认为朗松摒弃了鉴赏趣味和文学享受，谴责他把文学化为历史，提倡过时的实证主义，除了对他的方法有信仰以外别无任何信念，又说他所推广的课文讲解方法未能上升到应用风格学这样的高度。书中引以为据的是莱奥·斯比策^①的言论，这位学者搞的是一门令人眼

① 莱奥·斯比策(Léo Spitzer)，《风格研究》(Etudes de Style)的作者。

花缭乱却又错误百出的科学，他本人也过分热衷于类似诡辩的反常的悖论。法国大学派的批评遭到诋毁，被说成是毫不生动活泼的批评；朗松被斥为“一长排文学阉奴的头子”。作者满腔怨忿，所写的这本小书有失公正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关于若干法国诗人以及关于普鲁斯特和纪德（他们本人是目睹那场论战的）的论文也十分蹩脚。它表明作者对朗松关于散文艺术，关于两三个世纪的法国文学的研究（朗松在这些研究中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以及对朗松关于文学史方法的批判性与理论性的看法一无所知。

毛病也许部分地出在居斯塔夫·朗松最精彩的著述散见于一些报刊文章，而其中大部未曾重印，今日很难找到。这个办事审慎、光明正大的人，他的一个值得赞赏的品德就是学术上的老老实实，这就要求我们在判断他的时候不是根据肤浅的论战，甚至也不是根据他的学生的说法（他们不免有些急于要把他的教导化为规律以构成体系，而忽略任何方法都顶不上应用这个方法的人这个道理），而是要根据他所写的文章。我们打算收进这个集子里的正是这样的文章。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觉得这些文章不仅对大学生们，也对文学、伦理思想和美的事物的爱好者都大有裨益。这些文章的现实性比一八七〇至一九二〇年间任何法国文学评论家的作品都更强烈。

本集所收论文，虽不能说是全部却也是绝大部分在今天已难以找到。近十个国家的许多同行都为此而感到遗憾，因此我们认为应该让我们的各级大学生，自预科生和修习文学史的低年级学生直至准备参加中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考试和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能从这些内容如此丰富，充满如许智慧的篇章中汲取养料。对于讲授文学课的教员，对于业余爱好者以及趣味高雅之士（朗松从来没有用太多高深的学问来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用从精神分析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那里借来的深奥的语言

使得他们脱离文学的轨道),也同样会有好处。他们能在集子里找到对蒙田、莫里哀、卢梭、圣伯夫和泰纳的严肃深入、富有启发的分析,透过这些分析而对这些作家认识得更加清楚,而这种认识既不是简单化到极点,也不是用来证明某个命题或者炫示批评家的高人一筹。

各篇文章首次发表的出处载在卷末目录中。关于探讨龙萨《择荃颂》那首诗的来源的短文,既有学术性,又富有才智和建设性。这篇文章既 not 机械,又非“实证”,而是突出讲明了诗人怎样通过阅读,从不同的前人手中借来材料,从而有所感受,有所想象,有所发明和有所创造。这样的研究文章根本不想把诗歌创作中所包含的神秘色彩去掉,而使我们看到了这份神秘色彩是多么的浓烈。

《两大陆评论》刊载的研究蒙田《随笔集》中的道德生活那两篇文章,在我们看来,是关于蒙田思想的最详细、最热情、最不偏不倚,也是最富有作者个人色彩的一篇研究文章。关于《随笔集》的评论者可谓多矣,他们当中有的要把蒙田描绘成纯粹的斯多噶式的禁欲主义者,或者是信仰主义者,或者虽是正派的天主教徒,然而对基督、赎罪、罪恶、悔恨并不关心;有的则把他打扮成地道的享乐主义者,打扮成十足的怀疑论者,从而使他成为一位狡猾的伪装的无信仰的大师,成为卢梭或者尼采,勒南或者纪德的先驱者。朗松则避免挑起任何可使这两类评论者欢腾雀跃的论战。蒙田的诠释者无不是脱离历史条件来引用他的文句的,给他的文句添上不符合时代精神,十六世纪的人难以认为是富有革命性的意义。朗松的方法则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这就是说他从来也不忘记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满脑书本知识的饱学之士总是把一个伟大的人物跟他的前人或者同代人之间的关系看得无所不在,但朗松却不被这样的诱惑所吸引。这样的饱学之士会面临双重的危

险，或者因为发现蒙田、笛卡儿、拉辛或卢梭跟某些默默无闻的前人在思想和主题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而看不见这些伟大作家新颖清新的创新之处；或者对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如此熟谙，以至把他们所写的每一行都说成是跟当时这样那样的事件和这个那个那个人物有关。他们的作品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它对后代人所包含的意义都在那中介物背后消失了，而那中介物却谁也无法得见——除了那位饱学之士本人之外。在朗松的著作中，并没有把蒙田的伦理学不恰当地加以体系化或理想化，变成高乃依作品中的那种英雄主义。蒙田从来不让自己整个身心投入某一种事业，哪怕是全国性的事业，也从来不愿意放弃对自己的自制。他既不能够，也不希望把他的思想体系化为一部伦理学论著。朗松笔下的蒙田的精神生活中含有纷纭的色调，这是一种不以思辨为目的而以行动为目的的精神生活。蒙田在不同凡响、洒脱自如的《论维吉尔的诗》里写道：“谁要是没有掌握‘善’这门学问，其他任何学问就只有坏处。”在他看来，人的本分不在于对他人有所要求，而在于做一个“真与善”的人，既不生硬僵化，也不放弃享乐与舒适——朗松对战争深有感触，在战争期间他失去了许多最杰出的学生^①，而经受考验的法兰西在他心目中显得恰如其分的庄严而优美，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以那样几个字来归纳蒙田留给我们的启示。

朗松善于在篇幅不长的评论中发表建设性的批评和清新的见解，而他也懂得赞扬值得赞扬的东西，懂得对过去未曾深入思考的问题重新思索，毫不显出自己高人一等，不象他那些迷途的弟

① 仅受过朗松指导或启发，而其作品不带一点宗派味道的唯科学主义色彩的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就有让·迪克洛，彼埃尔·莫里斯·马松，阿尔贝·卡萨涅，若阿香·梅朗等人。另外一些，如乔治·阿斯科里、雷蒙·纳夫等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纳粹集中营中。——原注